

## Mao Fugang: a Neglected Practitioner and Researcher of Chinese Journalism

Liu Lanzhen Tan Jiali

**Abstract:** Wolfgang Mohr, a German sinologist, has worked in China's press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China's first four page wide lb401 wheel transfer press. He has a unique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newspaper industry, and has written three volumes of "China's modern newspaper". Based on rich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the author'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newspaper industr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up to 1965, with text explanation, personal drawing charts and collection. Based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t that time, it not only introduc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newspapers, but also conducts case studies on influential newspapers and news events. The contents are detailed and rich. It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German Sinologists to study China's modern newspapers.

**Key words:** Mao Fugang; Chinese press industry; Data survey; Chinese modern press

Received: 2020-12-12; Accepted: 2020-12-28; Published: 2021-01-22

---

作者简介：刘兰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谭家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评析》部分成果，项目编号 14YJA860011。

文章引用：刘兰珍，谭家莉，毛富刚：被忽略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 [J] . 中国新闻评论，2021，2（1）：74-85.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1007>

# 毛富刚：被忽略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

刘兰珍 谭家莉

**摘要：**德国汉学家毛富刚（Wolfgang Mohr），曾在中国的报界工作过相当长时间，并参与过中国第一台四版宽 LB401 型轮转印报机的设计制造。他对中国近现代报业发展的历史有着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并著有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报刊》，该书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作者的亲身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自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后，到 1965 年，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进程，以文本说明、亲绘的图表、收集的报刊复印件形成三卷本，立足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既介绍了中国商业报刊的整体发展，也对影响重大的报刊及新闻事件进行个案研究，内容详实丰富，是后来德国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报刊的重要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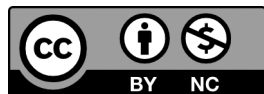
**关键词：**毛富刚；中国报刊业；数据调查；《中国现代报刊》

收稿日期：2020-12-12；录用日期：2020-12-28；发表日期：2021-01-22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近年来，德国、美国和日本汉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逐渐得到国内新闻史学界的关注。但其中有一个既有长时间在中国报界工作的实践经历，同时又有丰富的中国报刊实物收藏以及研究的人却长期被忽略。他，就是德国汉学家毛富刚。

## 一、毛富刚生平及其在华新闻活动

关于毛富刚的生平和事迹介绍的文字非常之少，包括德国的谷歌搜索上也难以找到有关他的资料介绍。

毛富刚，原名沃尔夫冈·莫尔（Wolfgang Mohr），1903年出身于德国慕尼黑，其父马丁·莫尔博士<sup>①</sup>是著名的新闻人和新闻学者，曾发行过《民族自由通讯》杂志，并担任过《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中黑森广告报》等数家报刊的总编辑；他是“德意志报刊帝国协会”创办者之一，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州的协会负责人，还担任过帝国协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他还是早期德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之一，与杜菲法<sup>②</sup>等共同创办了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大学报学系。

毛富刚子承父业，1924至1927年他在其父所创办的新闻系做实习生，并在柏林著名的东方语言研讨班学习中文，这为他后来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他当了机械制造工程师，旋即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23年。根据秦瘦鸥的文章记载，专攻印刷机械制造和修理的毛富刚来中国后，于1932年至1942年先是在孔士林洋行当工程师，这是一家向中国各大报馆出售机器的德国工业公司；1942至1943年他与秦瘦鸥一起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政汇报》，但该报不久即被日本占领当局所禁<sup>③</sup>；从1946至1955年他在上海精成机械厂担任车间主任。这家工厂解放后成为了国营工厂。作为机械制造工程师，他设计和制造了中国第一批滚筒印刷机。在中国的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除了日常工作外，作为不同中国报纸的出版合作人，他与众多当时的社会名流过从甚密，主要是政界、文化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sup>④</sup>。

因此，毛富刚和当时的著名新闻人张竹坪、黄公韬、潘公展、何亚西、汪伯奇等都很熟悉，对于中国报界的内幕，也十分的清楚，被誉为中国通。七七事变前，他曾根据英文报馆所用的排字机的原理，设计成一种中文排字机，其字盘部分，完全与中文打字机相同，能大大提高排字的速度。

毛富刚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文化兴趣浓厚，不仅生活习惯上向中国人靠拢，而且对中国的古书极其热爱，对中国的版本学颇有研究，深厚的汉语与文化知识的积累，为他后来编写《中国现代报刊》打下了基础。

① 毛富刚之父马丁·莫尔博士生平参见 Gunda Stoeber. *Pressepolitik als Notwendigkeit* 一书第13页注释107。

② 埃米尔·杜菲法（1890—1969），德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基民盟（CDU）创始人之一，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新闻系教授和负责人，出版有《报学原理》（一）（二）、《新闻人格》等著作，是著名的伊丽莎白·诺依曼的博士导师。

③ 秦瘦鸥. 怀毛富刚 [J]. 天地, 1942 (1).

④ 关于毛富刚的生平和早期经历，参见鲍吾刚（Wolfgang Bauer）为毛富刚的《中国现代报刊》所做的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毛富刚在中国短暂的参政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作为德国人的毛富刚，其政治主张显然与德国纳粹政府相近，也因其妻子为日本人，他也极力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和日本合作，而不是与英美结成联盟。在汪伪政府发表的《外交公报·专载》曾提及毛富刚在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以个人名义的斡旋活动。其汤（良礼）次长在一次与国内外新闻界的联欢大会的致词中提到毛富刚在抗战前期的政治活动：“当大多数中国领袖还在想念着与英美，尤其与美国合作以对抗日本的时候，我们有少数人，……德国学者毛富刚先生，……就想到我们不应随波逐流，与日本为敌，而应与日本为友……毛富刚先生时正经营商业，曾自备资斧，到过日本数次，从事初步接洽……。”<sup>①</sup> 不过，从后来其办报被禁的事实来看，毛富刚并未与汪伪政府和日本沆瀣一气，而是转而与中国抗日报人联系在了一起。

1949年之后，毛富刚来到了国营精成机器厂担任工程师，并于1952年与中国的机械工程师施旦民等一起合作设计成功我国第一台四版宽轮LB401型转印报机，每小时生产四版报5万份，可套色，具有50年代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各省市大型报社采用，博得好评，为我国建国初期新闻出版事业提供有效设备，节约大量外汇，并创汇出口香港《文汇报》；同年二人再度合作采用通用化设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四版宽双组LB402型轮转印报机，每小时生产四版报10万份，最多可生产32版套色报纸，为《湖北日报》《工人日报》采用；1954年为《河北日报》成功改装德国“Vomag”轮转机，利用旧机器多余的印刷、折报等零部件改制成一台四版宽、每小时5万份的印报机，为节约国家投资开辟了道路。<sup>②</sup>

此事从常世英主编的《江西省科学技术志》中也可得到证实，书中记载：1951年春开始使用精诚厂生产的32英寸中速轮转机印刷《江西日报》。这种轮转机是西德工程师毛富刚设计的，每小时设计产量为24000份对开报纸，实际每小时可印20000份。这是江西最早掌握轮转机技术印报，实现了从原来一次只能印单面两次印双面报纸的平压平型印刷机型，向一次能同时印出双面报纸的圆压圆型印刷机型的转变，提高工效10倍<sup>③</sup>。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毛富刚和施旦民所设计的印刷机工作效率的回忆，是有差异的。

1955年，毛富刚离开中国，回到了德国。随后，他被刚成立不久的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聘请，专门讲授中国报刊历史与概况。

在中国工作和停留期间，在工作与对中国文化、书法和绘画的研究之余，毛富刚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中国报刊的历史，并积攒了从1872年以来的许多报刊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绝大部分在战争中被毁，但所保留下来的一些重要的原件，依然能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到当时中国报

① 参见汪伪政府《外交公报·专载》第41期《中日德义五大通讯社庆祝轴心国承认国府联欢大会徐部长汤次长致词》，出版年代不详。

② 施旦民. 我与轮转印刷机[J]. 印刷天地, 1999(11).

③ 常世英. 江西省科学技术志[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793.

刊发展的原貌。

毛富刚于1979年10月7日在慕尼黑去世<sup>①</sup>。他对于中国新闻发展历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于他的著作《中国现代报刊》。

## 二、《中国现代报刊》内容分析

1976年，德国威斯巴登的弗兰兹·施泰纳出版社出版了毛富刚编写的三卷本的《现代中国报刊》。

《中国现代报刊》为慕尼黑大学所出版的慕尼黑东亚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由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主编，由三卷资料性的内容构成，因此其副标题为“*Ihre Entwicklung in Tafeln und Dokumenten*（图表与文献）”，这充分表明该书以图表与资料文献为主。本书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自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后，到1965年，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进程。

这套丛书共为三卷，第一卷为文本说明，包括摘要、编者前言、作者前言、引论、正文和目录索引。第二卷为作者亲自绘制的图表，包括文字说明、目录索引、资料来源证明、资料复印、地理分类的图表和文献，还有时评（约从1800—1965年）。在前言中毛富刚写道：图表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到特定时期的报刊发展概况，以手头的数据为基础可以构建平行的想象。第三卷为作者所收集的中文报刊的复印本。这套丛书重点介绍了在政治局势转变时期，权力中心逐步瓦解、意识形态逐步建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报刊业的结构转型。其研究立足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同时以详实的资料介绍了中国商业报刊的整体发展，并对影响重大的报刊及新闻事件进行个案研究。为了让这些内容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作者收集了大量中文和外文文献，并优先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引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富刚对中国报刊发展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报刊史经历了三次重要发展：中文的报刊在排印和内容上符合西方意义的“报纸”的定义和内涵，是在鸦片战争（1839—1842年）之后；太平天国（1850—1864年）到1858年，是以西方报刊为范本的产物；封建帝国时期出现的官报可以作为现代报刊的突破。

毛富刚认为，如果把现代时期中文报刊在19世纪初的发行看作中国报刊发展的开端，那么这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只能被看成勇敢、有趣的先行者。除了纯粹的天主教宣传之外，它们在19世纪末带来了新的大众文化信息，使受皇权束缚的中国印刷技术与欧洲的印刷技术得以交流。但由于传教任务的束缚，在现代化的中文报刊产生后，它们失去了文化传播的意义。

19世纪开始在中国发行的“小报”（也称“京报”，是“清报”的一种）是一种官方的、

<sup>①</sup> 鲍吾刚，怀毛富刚[J]．东亚自然与人种学学会简讯，1980（127/128）：11-13．



每天发行的刊物。这种早期的官报从内容上吸收了可以公开的宫门抄、明发谕旨和大臣奏章，形式多样，丰富有趣。但是小报在内容选择上并没有报纸的特点。小报的内容被民间印刷房逐字逐句地印刷，没有任何删减。1900年“官报”出现，代表着1895年后官方报纸向现代化转型，有独立的编辑，内容更加专业，风格向报纸靠近。

中国现代报刊的第二个发展（1858年）是民营报和商业报。自从欧洲语言的报纸在中国出版以来，在中国紧跟着成立了发行中文报纸的私营出版社，例如1858年在香港和1861年在上海，中方、外方企业家或中外合伙在大陆重要城市和海外创办报刊，引导、促进了中国报刊的商业化。他们同时在华语区现代报刊传播和广告领域创造了显著的、历史性的突破。直到新中国成立早期，在很长的时间内商业报刊在排印和风格上都保持着创刊初期的形成的传统模式。直到约1916年后排印形式才普遍宽松，报刊文体内容也有了转变。为了配合1916–1925年间新文化运动对进步报刊的需求，一些报刊的私营性质发生了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的是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发展和印刷数量的显著上升。

第三个发展是有力的政治报刊（即期刊），从“改革派”和“革命派”各自的宣传机构中诞生（1896年后）。“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争辩使这些报刊变成有用的现代的传声筒，是对过时的封建政府和公共生活结构的一次政治、文化和管理的更新。两党的宣传机构，持着完全相反的政治目标，以独特的现代化的政治论战和新创语言通过报纸和期刊在内地、尤其在海外产生了影响，并为清朝巩固海外殖民地创造了新的途径。两党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尤其体现在他们不时激烈的唇枪舌战上，传播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据地，甚至发行到了海外，一直持续到1911年革命爆发。

丛书的文本说明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封建时期到1911年末，主要介绍官报和小报。第二部分以时间为节点，分为1912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再按政治地域划分，详细介绍在不同政府统治下，即分别为北洋政府、南京政府、1945年后的台湾地区、1949年后的大陆地区、1945–1965间海外地区的新闻业发展。书中包括作者对报业集团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包括：1957年《人民日报》的内容分析，1872–1949年间《申报》出版社发展研究，1884–1898年《点石斋画报》的研究，1906–1958年中国新闻法、新闻法规和出版条律的研究。

在这部丛书里，毛富刚对中国报刊业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对新闻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分析

毛富刚认为，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时局变化联系紧密，报刊的发展离不开其作为公共领域发挥的功能。他写道：“1900至1908年出现了报业的“黄金时代”，在国人办报不成气候的情况下，除了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报刊外，革命派所创办的报刊代表了当时报业发展的

平均水平，其中水准最高的当属《民报》。”“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论把中国新闻业从革命时期到今天的发展呈现到了世人眼前。”

而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控制也钳制了新闻业的自由发展。“1916年废除《修正报纸条例》减轻了对新闻业发展的钳制。由于各省获得的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加上一战爆发后对信息的需求激增，中国新增约290家报业。”

他不止一次评论到，动乱的时局催生了大量的信息需求，新办报纸数量激增，这样促使了中国新闻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从报刊增长的数量上看，1916年到1926年报业发展停滞不前，直到1927年报刊数量才有了飞跃式的增加。这种现象是与社会长期动乱相挂钩的。”因为“1916年到约1925年间，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都处于转型时期，这时报纸不再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杂志”。

但事实上袁世凯政府颁行的《报纸条例》一直到1926年初仍在生效，从西方“新闻自由”的意义上严重限制了中国新闻业的自由发展。1928至1949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管制，中国新闻业也并未如人们期待的发展，然而在此期间，新闻业还是出现了阶段性的繁荣。他分析了1928年至1934年我国新闻业出现短期繁荣的原因。

首先1928年革命军北伐成功，推翻北洋政府。他特别提到北伐不仅是军事手段上的胜利，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拥有的现代化系统的宣传手段在北伐中做出了贡献。各省长官宣布效忠国民政府，给大陆统一、政治安稳的局面带来了希望。这一年报刊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报社纷纷往沿海大城市集中，特别是有外国租界的城市。报刊总数由1931年的488份上升到1932年的867份，这是1928年后办报高潮的风向标。

“在1928年后几年只有少量报纸仍拥有较大发行量。具有国际声望的报纸还没有出现。”对此他认为，以1931年和1932年的上海事件为导火索，日本对中国一步步侵占，导致全国范围的抗日活动，因此社会对报纸和信息的需求也急速增加。政府严格规定报纸登记的条例，虽然对报业发展做出了一定限制，对企业家来说反而不是坏事。

## （二）对主要报刊和报业集团的评析

毛富刚对报纸做了定性、定量研究，通过调查等方式，记录各大报刊阶段性的发行量数据，比如为了得出1937年确切的报业发展情况，他展开了全国范围的调查，调查范围限定在日发行量在10000份及以上的大城市，即拥有共388份报纸的35座城市，调查的来源包括一些办报人自称的数据，并对数据做出了适当调整。这次调查数据展示了中日战争前中国日报业的繁荣景象。他将数据与1934年相比，发现一般报纸和国民党党报的发行量都有所上升，比如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的年销量达到了100000份。1937年在大城市登记过的报纸数量明显减少，报刊出版向大城市集中。上海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自1937年起保持着居高不下的发

行量。

此外，他对中国报纸的单独研究也引人注目。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他对《申报》《点石斋画报》《人民日报》进行了单项研究。

### 1. 《申报》销量研究

有可靠的、丰富的、持续发售的数据材料支撑我们纵览《申报》，它既是上海最具商业代表性的报纸，也是最古老的持续发行到1949年的报纸。这些数据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它们构成的曲线在测量社会事件上也具有价值。

《申报》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出于兴趣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合资创办，经营和编辑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1884年5月8日增办中国第一份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旬刊），创设申昌书局并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进行多种经营。

《申报》的发行量保持到1912年。在这40年里《申报》的发行量是无意义的数字。普遍认为《申报》言论过于保守，需进行现代化改革。

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后情况有所好转，1914年受战争影响发行量大幅提高。1925年日发行量已达十万。

《申报》与其竞争对手《新闻报》一起，是到1949年为止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作为纯商业报纸，《申报》一直避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然而1937至1945年却失去了经济独立性。1945年由国民党控制，1949年被共产党接管。

与此同时这家中国最老的报纸出至第25599号终刊，《申报》馆是中国现代民营企业的标杆，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 2. 《点石斋画报》特色研究

毛富刚认为画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范围，这些创刊于1912年前的石印画报应该是商业报刊中独特的分支，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艺术和印刷术的价值。其中，最具艺术价值，同时也是模范杂志的当属《点石斋画报》。

1884年5月《申报》馆出版了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点石斋画报》是当时最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最成功的画报，其后追随者无论在印刷或报纸上都没有超越。吴友如离开《点石斋画报》后，主持《飞影阁画报》，二者在风格上十分相似，都获得了成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文明与科学技术涌进中国的沿海城市。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附设土山湾印书馆开设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平板石印机构，用照相版技术翻印中国古籍。安纳斯·美查利用印刷技术热潮，从法国耶稣会成立的土山湾印刷所请来了秋子昂，成立了点石斋印书局，并购置了相关印刷机器。



书局首先成功印出了《康熙字典》，销售10万份。此后又用石印技术印刷了多份书刊。短期内经多次尝试后，书局终于开始出版《点石斋画报》，每册八页九图，16开本，目录为彩色。主要内容为时事、新知、奇闻、果报。采取图主文辅的表现手法。<sup>①</sup>

《点石斋画报》采用干支纪年法，每12期换一次纪年，第1至12期为“甲”，第13至24期为“乙”，以此类推。由于资料缺失，只能看出画报连续出版到1898年。

毛富刚认为，这份刊物将因为其印刷技术的卓越、绘画的精致留名。只是部分合集装订的失误使它不尽完美。

### 3. 1957年《人民日报》内容分析

《人民日报》在1956年2月6号这期曾发出公告，要求将过去的风格冗长的报道或评论缩减，来完善、丰富报纸的内容，增加信息的多样性。毛富刚认为，报道的删减幅度应该从减至一万篇达到最多留下2000篇，使每一页上应该有10-12种不同形式的标题。

毛的研究证明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的政策使第二方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只占18%。1957年报道内容丰富的《人民日报》并未受到“整风运动”的影响，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说教和洗脑。

从1957年《人民日报》的大字标题中收集共26700个关键词，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外交政策。这一方面的报道建立在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关系上，这些词语描述了此时期的外交方向。社论集中在中国参加外交活动的需求。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属于次要等级。

第二方面，宣传共产主义。1957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掀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5月掀起，8、9月到达高潮后，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也随之下滑。“整风运动”这个词在5月出现的次数最多，6月受舆论批评出现的次数最低，8月到12月的使用率上升到5月的一半。

第三方面，经济。受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与经济相关的词汇也出现地较多。“国家经济”一词在报道和社论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工业”。

第四方面，对内政策。文学、戏剧、电影、运动，文化生活方面的词汇出现次数也在增多。人民日报在1957年关于文化生活的报道吸引了读者极大的兴趣，展现了文化生活领域生气勃勃、丰富多彩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卷。其中，行政问题排在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之后。

引人注意的是在印刷出版和编辑方面，《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参与度与以往几年相比，他们在这一年显得非常活跃，参与编辑了381篇社论和243篇出自评论员和观察员之手的文章。

在“单项研究”中，毛富刚对当时报业集团的研究是以《大公报》《大光报》《新疆日报》

① Brandt M V. Der Chinese wie er sich selbst sieht und schldert [M]. Berlin: D. Reimer, 1911.

《华侨日报》《星洲日报》等分别作为大陆、海外报团的代表，概述报业集团形成发展的过程。

他指出，中国的报业集团于1920年后开始形成，1937年抗战爆发前规模壮大。正规的集团模式首先成形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中文报纸。在国内，国民党机关报和民营报业的报业集团才有发展的势头。《申报》和《新晚报》这两家大报都没有试图向报业集团发展，虽然极力避免报纸的政治色彩，在战后仍然受国民党牵连，被当成其报业集团的一部分。战后，国民党报业集团被吸收进极权控制系统，孤立于其他所有的政治倾向性的集团之外。

对报业集团的研究对报刊史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他首先研究大型党派的报业集团，国民党及政府机关报和军方报刊《扫荡报》（后来改名为《和平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共产主义报刊史上报业集团建设唯一的证据。

其他的报业集团里他集中介绍了《世界日报》和《立报》，值得一提的是《立报》和《民生报》的负责人成舍我，他证明了用小型报的形式也能发行政治性的报纸，小型报也并不是“蚊子报”的唯一特征。在上海和南京他的小型报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巨大成功。对于报业集团的评价还有《益世报》，最古老的著名报纸之一，连续出版到1949年。《新民报》是战后第一家采用本土制造的书版轮转印刷机，用中国制造的这些结实的机器，战后十年建立了多家报社。本土的轮转印刷机建造业最终被中共和北京当局重视，并鼓励发展。

### （三）对报业中心形成、发展的分析

对报业中心的研究集中在图表里，他将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制成了地图，用彩色标识出报业中心城市，对照图表分析其发展状况。

他写道，1915年已经出现了四个重要的报业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北平，经济中心天津、上海、广东已发展出了自己的报纸风格。1915年五大城市的报业总数为71份。1934年报业中心的数量从39个上升到58个。上海超过北平，成为全国最大的报业城市。北平报纸的总数虽然有所增加，然而发行量却不尽如人意。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依靠领先的技术和庞大的报纸发行量成为全国的报纸中心，从未失去其领先地位，并严重妨碍了南京报纸的发展。政客及政府官员也愿意在上海多做停留。政客多自己办报发声。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逃过政府的直接管辖，党内批评者也可以逃过审查，通过报纸表达意见。

1937年大城市登记在案的报纸数量明显减少。由于发行量攀升，他只选取日发行量过万的35座城市，前七位为上海、香港、天津、广州、北平、南京和汉口。这段时期报刊出版向大城市集中，一般报纸和国民党党报的发行量都有所上升。比如上海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自1937年起保持着居高不下的发行量。但是7个报业城市的报纸发行量存在明显的差距。例如汉口报纸日发行110000份，而杭州只有64000份。并且杭州29份报纸的总发行量都比不过上海《申报》每天150000份的发行量。这是由于这三座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都有外国租界，

报纸可以寻求保护。香港尽管不处于内地，但直至1949年一直被视作属于内地的报业城市。中日战争爆发后，政府节节败退，沿海报纸的收益迅速亏损。

上海和天津的发行量波动幅度和小报的庞大发行量非常引人注目。南方各城市坚持自己的风格（如拒绝发行小报），报纸发行量波动幅度较小；没有像《申报》和《新闻报》或《大公报》《益世报》这样的大型出版社。战争爆发至1941年，上海和香港失去后方支援，变成了报业孤岛，报纸销量也减少了。

#### （四）对1906–1958年中国新闻法、新闻法规和出版条律的研究

在甲午战争后，报刊只有拥有像“革命派”或“改革派”创办的报刊那样大的影响力，清政府才会通过法律限制其发展。

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例》，对记者和作家基本没有约束力，唯一有影响的是1903年苏报案。

1906年是制定现代化的报刊出版物规范的元年。1908年第一部报刊法生效。然而那时报刊大多在租界内创办，新闻法规始终起不到实际作用。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保障了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由于政治原因，中华民国直到现在的台湾一直没有真正的出版自由。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出版法，它的专制规定对今天报刊仍有影响。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其专制性依然未有改变，对出版自由的呼唤和对审查制度的抗争贯穿了整个现代报刊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控制刊物，一切旧的新闻法规自行废除，新中国颁布的《共同纲领》保证人民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里的自由有着不同的含义，即从此以后，报刊摆脱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审查制度也无需存在，因为新闻的安排是受国家控制的。

党和政府在某个路线的指引下工作，并指导着新闻业的统一。“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报纸有权公开批评权力机关。这些批评非常严厉，并起到了监督作用，机关会迅速整改。这是中国在开放媒体言路上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整风运动”，提出意见的媒体被扣上“世俗”和“狭隘”的帽子。

此外，在书中，毛富刚还对中国的通讯事业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他认为成立严密的新闻检查网、中央党报和中央通讯社形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新闻事业网，加紧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对全国新闻事业进行垄断、控制和迫害。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典型事物是所谓的“通讯社”的繁荣发展。在附表中详细地展示了南京政府当局登记和未登记的“通讯社”的数量和地点。

但是无论国营、私营，“通讯社”总体数量少，因此被当成散播流言的公司。通讯社通常收集一些内部信息，在报纸的生活板块发表生活的调料。这个时期报社派出的记者也不能完全取代这些“通讯社”。

### 三、《中国现代报刊》的影响

这本书虽然几乎从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它对德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者的影响却非常之大。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瓦格纳的著作中，数次引用毛富刚书中的资料，而后的学者如海德堡大学的梅嘉乐、燕安黛和费南山等，在其著作中都无不引用他的资料与观点。

书中使用了大量他自己积攒的原始资料。比如曾经引起卓南生教授极大关注的《香港中外新报》，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所引用的是报纸原件的出版时间为1912年<sup>①</sup>，卓南生在其《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所提及的报纸原件是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报》<sup>②</sup>，并且对这一发现表现出十分的兴奋。而在毛富刚的书中，他使用的则是1885年7月9日（光绪十一年乙酉五月二十七日）的报纸原件。虽然这个原件比卓南生所发现的报纸出版日期要晚13年，但该书的出版时间却比卓南生的书早30多年。只可惜国内学界一直无人关注到这些珍贵的资料。

作为西方人的毛富刚拥有与国内新闻史研究者不同的视野，他对写作的毫无偏见，使他的著作客观、可信。这是一部庞大的著作，它的内容和资料数据都足以让人看清中国报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变化，作者力图通过严谨的语言和精确的数据还原史实。

毛富刚研究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毫无疑问是他收集的精准数据和资料。本套书第二、三册分别相当于研究数据和研究资料的合集，第二册《图表》共178页，收集了自中国报刊近代化以来的各地中文报刊的详细数据，作者在基础数据表之上还增加了各时期报业中心的转移图和报刊发行量的逐年变化表。这些亲手收集的数据和资料使他的研究真实、可信。

毛富刚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始终是由丰富的资料作为支撑和佐证。精通中文、对时局变化的敏感和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使他能在政治时事变换的格局下来分析报刊发展的走向。他不偏向于参与政治局势中的任何一方，这使他在介绍政党机关报刊时始终保持了中立客观的态度，不会刻意隐瞒或者抹杀对任何一方不利的事实。

本丛书主编、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评价曰：他所收集的中文报纸不仅能够用于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他能够将收集的庞大数据做成地理图表，使这三本书在视野上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他参与了报刊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中文报纸的内容罗列和总结，甚至可以当作毛富刚自传中的一部分。毛富刚的一生已经与中国报刊的发展史紧紧的相连，希望通过笔者粗浅的介绍使毛富刚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在中国得以传播，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做出贡献。

①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7.

②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8.